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困境和优化路径

许瑶瑶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背景下, 农村养老面临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供给不足、城乡养老资源失衡的多重困境, 互助养老凭借低成本、本土化、适配乡土社会的特征, 成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文以老龄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研究基础, 系统分析农村互助养老的兴起背景、实践类型与时代价值, 从三个维度剖析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集体经济支撑乏力、互助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精神文化服务缺位等现实困局。在此基础上, 从构建多元协同资源供给体系、激活互助主体内生动力机制、拓展养老服务内容维度、完善制度保障框架四个方面, 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以期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互助养老, 农村养老, 养老服务供给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Rural Mutual-Aid Elderly Care Model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Yaoyao X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30,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urban and rural inversion, rural old-age care faces multiple dilemmas of weak family old-age care functions,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old-age care supply,

and imbalance of urban and rural old-age care resourc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ost, localization and adaptation to rural society, mutual old-age ca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old-age care. Taking the theory of ageing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s the research basi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background, practice type and value of the times of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old-age care, and analyses the reality of weak collective economic support,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mutual aid, and lack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building a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resource supply system, activating the endogene power mechanism of the main body of mutual assistance, expanding the content dimens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ramework, a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participation in improving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Rural Elderly Care, Senior Care Service Suppl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面临的重要社会课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除西藏尚未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他 30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步入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均超过 7%，其中有 12 个省市自治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4% 的超老龄化标准线，我国整体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1]。而农村地区因人口外流、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因素，呈现出老龄化程度更深、空巢化更突出、养老保障更薄弱的城乡倒置特征，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机构养老与商业养老因地域、成本等因素难以在农村全域推广，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民生保障的重点与难点。在此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成为破解农村养老困境的重要实践，且已被纳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学界对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可归纳为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三个主要视角。社会学视角侧重于互助养老的社会基础，如代秀亮[2]指出互助合作的历史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和孝亲敬老的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互助养老的社会根基，聂建亮等[3]发现地缘信任和制度信任可显著提高农村老人的参与意愿。管理学视角聚焦于组织运行与治理结构，胡志平与袁凤欣[4]揭示了基层组织通过制度、组织和资源嵌入激发内生动力的运行逻辑。经济学视角则关注资源配置与激励相容问题等，王辉[5]指出财政投入不足、社会资源有限、组织自我造血弱是制约长效运行的三大困境。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理论视角上，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少；在研究内容上，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与互助养老的关联分析有待深化。

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共同体、人的全面发展等理论，从物质基础、主体关系、精神文化三个维度剖析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困境，并针对性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实现长效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2.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基础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生成与发展，既扎根于我国农村人口结构转型、社会治理变革的现实土壤，又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互助合作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滋养，更契合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导向。

2.1. 农村互助养老的兴起背景

农村互助养老的兴起是我国人口结构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大、空巢化与失能化现象突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63.89%，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提升 14.21% [6]，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直接引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冲击下不断弱化。从养老服务供给端来看，城乡养老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差距。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共 38.7 万个，养老床位 829.4 万张，其中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为 23.2 万个[7]，供给缺口十分突出。机构养老、商业养老在农村地区因成本偏高、布局不均、文化适应性差等问题，难以实现全域覆盖。在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下，低成本、本土化、贴近乡土社会的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弥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重要路径。从理论逻辑来看，农村互助养老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关于互助合作、“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邻里守望、尊老敬老的价值理念相互融合，构成了农村互助养老的深层理论支撑。从政策逻辑来看，互助性养老已经从基层自发探索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互助性养老，在政策引导与支持下，农村互助养老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成为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2. 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实践类型

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农村互助养老形成了多种运行模式，根据主体力量、资源来源与组织方式的差异，可大致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村庄内生型互助养老。以村集体、村民或老年群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核心，依托乡土人情与熟人社会开展互助活动，具有自主性强、本土化程度高的特点。二是内外结合型互助养老。在村庄自主运作的基础上，引入外部资源与专业力量，形成内部互助与外部支持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既保留乡土底色，又提升服务规范性。三是政府推动型互助养老。由基层政府主导规划、资金支持与组织实施，具有覆盖面广、稳定性强、推进力度大等优势，是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重要形式。总体来看，不同类型的互助养老模式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多样化、适应性强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格局。

2.3. 农村互助养老的时代价值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契合农村实际的养老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从经济维度方面看，互助养老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缓解农村养老压力，充分利用乡土社会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降低家庭养老负担与公共财政支出。在社会治理方面，互助养老有助于重建乡村社会联结，增强村民之间的情感纽带与责任意识，推动形成守望相助的村庄共同体，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与效能，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在人本价值方面，互助养老超越了简单的物质供养，强调老年人的主体地位与参与权利，鼓励老年人在互助中实现价值、获得尊严，推动积极老龄化理念在农村落地，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在国家战略维度，农村互助养老与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它有助于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

3.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剖析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困局并非单纯的管理或运营问题，而是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社会共同体解构、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缺位的集中体现。这种困境根植于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呈现出物质基础、主体关系、精神文化三维度的系统性短板。

3.1. 物质基础的脆弱性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深陷物质供给困局，本质是生产力滞后引发的生产关系适配失灵，难以支撑模式长效运转。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配的理论视角审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的深层根源，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生产关系调整尚未完全释放出制度红利。以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例，本应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但偏远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价值低，土地流转收益多归农户所有，村集体提取的公共积累有限，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养老资金池。即便有基层政府小额补贴，也仅能维持短期运转，传统意义上集体统一分配、缺乏市场化激励的普惠性互助难以为继。其次，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互助创新模式，试图通过劳动量化存储实现代际交换，但在农村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社会交换体系不健全的背景下，这类互助劳动难以实现普遍的社会流通与等价交换。低偿甚至无偿的互助服务，无法在市场经济逻辑中获得价值承认与正向回馈，低龄健康老人付出的照料、陪护等劳动，既无法转化为经济收益，也缺乏制度化的价值回馈机制，违背了劳动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长期的无偿付出导致参与者动力持续枯竭，互助行为仅能依靠短暂的道德自觉维系，难以形成常态化、可持续的参与格局。

3.2. 主体关系的离散性

传统农村社会依托血缘、地缘形成的熟人共同体，是互助养老天然的社会土壤，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真实共同体逐步解体。调查数据发现，2015年我国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的实际参与率约为37%，而同期有参与意愿的老年人占比为72.2%，实际参与者仅为有意愿者的约一半[9]。这一“意愿-行为”落差反映出互助养老在主体动员和参与转化方面存在明显障碍。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审视，行政吸纳社会的治理模式实质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整合”，这种整合在提升政策执行效率的同时，也挤压了村民自治的空间。首先，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逻辑向农村社会渗透，逐步消解了传统乡土社会中邻里守望、尊老敬老的伦理共识，血缘与地缘构建的情感共同体日渐瓦解，原本根植于熟人社会的自发互助，失去了情感纽带与伦理支撑，变成了无温度、无黏性的零散行为，互助养老的社会根基持续松动。其次，基层政府在推进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过度行政化、大包大揽的问题，“以政府为主导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在合作生产的授权、设计和评估阶段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其他合作主体则处于边缘位置”[10]，基层政府将互助养老纳入刚性行政任务范畴，忽视了其“村民自治、自发互助”的本质属性。这种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使得互助养老沦为基层政府主导的“被组织活动”，老年群体从互助养老的主体异化为被动接受服务的客体，僵化的行政指令取代了使得互助养老失去了民间活力与本土生命力。

3.3. 精神文化的匮乏性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陷入了“重物质、轻精神”的单向度误区，忽视了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诉求。“有生活生产能力的老年人，他们需要的是有意义的老年生活，是高级的需求”[11]，但如今实践中的互助养老，大多停留在解决老人吃饭、看护、生活照料等基础物质供养层面，将老年人视为单纯的“供养对象”，而非具有社会价值、精神需求的独立个体。既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精神慰藉、心理疏导、文化娱乐服务，也未搭建平台让老年人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导致农村老人即便满足了物质需求，仍深陷孤独、空虚、自我价值缺失的精神困境。这种仅聚焦物质供给的片面帮扶，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导致互助养老局限于基本生存保障，无法有效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发展需要与美好生活追求。

4.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化路径

破解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困局，须立足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乡土社会结构特征与老年群体多元需求，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使农村互助养老真正发挥其保障农村老年群体民生福祉、重塑乡村共同体、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

4.1. 构建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体系

资源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互助养老长效运转的核心瓶颈，而夯实互助养老物质基础、破解发展困局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政府单一投入、村集体无力支撑的被动格局，搭建政府、村集体、社会、个人协同发力的多元供给体系。首先，要使得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实现良性运营应充分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支撑效能，依托农村土地流转增值收益、集体经营性资产租赁收入等稳定收益来源，划定固定比例注入互助养老专项基金，实现资金闭环管理与专款专用，缓解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导致的物质支撑乏力难题，让互助养老拥有本土造血、稳定持续的物质根基。其次，需要建立科学化、可持续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推行动态投入模式，基层财政重点发挥兜底和引导作用，将侧重投向养老设施适老化改造、服务人员专业培训等公共领域；村集体依托自有收益补充日常运营资金，保障基础服务不间断；针对具备一定经济能力的老年群体，推行普惠性低偿服务，兼顾养老服务的公益属性与可持续性，避免无偿服务带来的资源耗竭与动力不足问题。最后，尝试探索“互助养老+”的融合发展新路径，紧扣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要求，将互助养老与乡村旅游、特色种养、农产品初加工等本土产业深度绑定，如依托田园综合体、休闲农庄打造嵌入式养老帮扶站点，组织低龄健康老人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取收益反哺养老，开发适合老年群体的康养体验项目，实现养老事业与农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赢，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增强互助养老的自我造血能力与可持续发展韧性。

4.2. 激活互助主体的内生动力机制

农村互助养老的生命力源于村民的自发参与和主动践行，破解参与动力枯竭、主体离散等问题，核心在于构建权责对等、公平可期、激励有效的内生动力机制，让互助行为从短期道德自觉转变为长期理性选择。首先，“‘时间银行’养老与我国农村现状之间具有诸多契合之处，但‘时间银行’养老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时间银行’制度优越性的发挥”^[12]，完善“时间银行”的县域统筹机制，搭建统一的服务登记、核算、兑换平台，解决以往时间银行碎片化运行、难以流通兑换、价值无法兑现的痛点，让低龄老人的互助劳动获得制度化认可与长效保障。在推进“时间银行”模式落地方面，应遵循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乡镇试点(6~12个月)，解决记录标准、兑换规则等问题；第二阶段为县域推广，实现通存通兑；第三阶段为区域互联，探索跨县互认。同时，应建立风险应对预案。针对积分通胀风险，设置积分与集体经济权益、村级福利的刚性兑换比例；针对服务纠纷风险，建立服务合同备案制度和纠纷调解委员会；针对平台运行中断风险，建立数据备份与线下手工记账的双轨制应急机制。其二，树立清晰的代际公平预期，强化“低龄服务高龄”、“今天服务明天”的理念传导，通过政策宣讲、典型示范等方式，让参与者感知互助服务的长远回报，消除无偿付出顾虑，激发村民参与意愿。其三，将互助行为纳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把积分积累情况与农村信贷授信额度、村级福利享受等实际权益直接挂钩，赋予互助劳动实实在在的价值回馈与社会认可，通过正向激励引导村民形成长期互助习惯，重塑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筑牢互助养老的群众基础。

4.3. 拓展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维度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强调，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不仅有物质生存需求，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马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社会总产品在进行多项必要的扣除后，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13]。基于这一理论内核，为了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良性发展应摒弃单一物质供养的粗放模式，立足老年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全面发展需求，推动互助养老从基本养老向品质享老升级，实现物质保障与精神关怀、被动接受与主动参与、生存保障与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是提升互助养老质量的核心方向。一方面，丰富多元化、多层次服务供给，打破仅聚焦吃饭、看护等基础生活照料的局限，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代际互动交流、心理疏导等活动，填补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空白，满足其多层次需求，提升老年生活品质。另一方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重建老年群体精神家园，依托村庄历史文脉、乡土民俗等特色文化载体，搭建老年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平台，组织老年人参与民俗活动、村史整理、家风宣讲等工作，增强老年人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效消解空巢、独居、高龄带来的精神孤寂与心理焦虑。更重要的是，全力保障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推动其从被动的被服务者转变为主动的互助组织者，鼓励老年人全程参与互助养老的决策、管理、监督与评价环节，充分发挥自身经验优势与余热价值，在参与社会事务、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人格尊严，真正践行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要义，彰显养老服务的人本温度。

4.4. 完善互助养老的制度保障框架

规范化、制度化是农村互助养老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需聚焦制度短板、管理漏洞与风险隐患，补齐政策规范、强化技术支撑、健全风险防控，构建全流程、闭环式的制度保障框架。首先，制定统一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标准与操作规范，明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权责边界、准入退出机制与质量考核标准，细化各类服务的操作细则，杜绝服务随意化、形式化、敷衍化问题，推动互助养老从基层自发探索向标准化、制度化运营转型。其次，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赋能提质，搭建集健康监测、需求精准匹配、服务全程追溯、积分管理、信息公示于一体的智慧养老系统，打通老年人养老需求与互助服务资源的精准对接渠道，简化服务流程、提升管理效率，实现互助养老的精细化、智能化运营。最后，建立“互助养老 + 小额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针对互助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损伤、责任纠纷等问题，联合保险机构推出专属小额意外险、责任险，由财政、村集体、个人按比例共同分担保费，降低互助参与的风险顾虑，保障双方权益，为农村互助养老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制度防线。

5. 结语

农村互助养老的长效发展，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一场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未来，还需进一步关注不同地区农村的差异化特征，针对农村差异，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实践模式；同时，可深化马克思主义养老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的结合研究，为互助养老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相信随着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互助养老必将在保障老年群体权益、重塑乡村共同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在乡土大地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J]. 中国统计, 2021(5): 10-11.
- [2] 代秀亮. 农村互助养老: 社会基础、历史演进与发展路径[J]. 社会保障评论, 2025, 9(2): 97-110.
- [3] 聂建亮, 唐乐.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5): 116-128.
- [4] 胡志平, 袁凤欣. 让“互助”运转起来: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何以实现[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2(6): 5-15.
- [5] 王辉. 农村互助养老长效机制: 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2): 65-75.

-
- [6] 侯佳伟. 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看我国人口发展新特点及新趋势[J]. 学术论坛, 2021, 44(5): 1-14.
- [7]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2022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79996614/attr/315138.pdf>, 2026-03-18.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9] 刘妮娜. 中国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服务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 老龄科学研究, 2018, 6(12): 63-74.
- [10] 朱火云, 丁煜.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路径优化——以 X 市幸福院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62-72.
- [11] 贺雪峰. 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村社养老[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4): 99-105.
- [12] 徐智华, 王旭. 农村“时间银行”养老的适切性逻辑与掣肘突破[J]. 兰州学刊, 2025(1): 152-164.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2-433.